

20 世纪咏史诗研究的历史回顾

冷纪平 刘怀荣

内容提要：张政烺先生发表于 1940 年代的《讲史与咏史》一文，揭开了 20 世纪咏史诗研究的序幕。但此后的 40 年里相关的研究论著却寥寥无几，直到 1980 年代以后，咏史诗的研究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咏史诗的界说、发展演变、类型及艺术审美特征等方面，对此进行简要的回顾，对于咏史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咏史诗；类型；发展；艺术美学特征

Abstract: The article *History Novels And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40s by Mr Zhang Zhenglang, started the 20th century's researching of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However, there was few researching works in the following 40 years until 1980s, when the study was noticed by the academe. Most scholars stressed on the aspects such as definition, evolvement, categor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It's undoubtedly meaningful for the deeper research of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by a simple review of that.

Key Words: History commenting poems Category Evolvemen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中国历史意识早熟和史学发达的传统，使咏史诗也成为古典诗歌中的一个特殊的类别。虽然《诗经》中就有叙述商周民族早期发展的诗歌，《离骚》中也有叙述历史事实的片断，但现存第一首以《咏史》标题的诗歌，却是晚自东汉才由班固创作出来，到萧统编《昭明文选》时，咏史诗开始被单独列为一类，从此，咏史诗的创作日渐增多。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的颠峰，咏史诗也不例外。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咏史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诗人们创作了大量艺术水平相当高的咏史诗。唐以后，咏史诗创作的得到了延续，并不断有作品问世。但咏史诗进入诗论家们的视野却是在宋代以后，明清时诗论家们对咏史诗的关注才稍稍多起来，虽然比较零散，却有不少精到的值得重视和借鉴的评点与论断。

系统的咏史诗研究是从 20 世纪才开始的，但 80 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就笔者所见，20 世纪最早对咏史诗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当推张政烺先生的《讲史与咏史诗》¹与差不多同时发表的程千帆先生的《左太冲〈咏史〉三论》。²张先生依据所掌握的材料，推定周昙的咏史组诗是其担任国子监直讲向皇帝进讲时的讲义。胡曾的咏史诗曾作为童蒙课本与讲史话本，因此虽然艺术成就平平，却仍能得以流传盛行数百年。张先生文章的立意在推究晚唐咏史诗对宋代讲史的影响，某些结论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其立足于翔实的资料对以胡曾为代表的咏史诗组诗创作所进行的研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程先生的文章结合左思的身世认为左思作《咏史》源于其妹左芬入宫，欲效法前代外戚立功扬名，求取富贵，《咏史》八首是“所怀不遂，因假古人以寓言”的言志之作，表现的是诗人从建功立业的用世热情到理想幻灭走向消极的心理发展历程。至于左思《咏史》的渊源，程先生以“假史言怀”为切入点结

合清人张玉穀《古诗赏析》所论，推其渊源为孔融的《杂诗》。认为二者不只在“风骨、辞气”上相似，而且在“标举史事，但期发扬襟抱”上也别无二致。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能找到的咏史诗研究的专文只有陈贻焮先生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³ 陈先生主要是以咏物诗与咏史诗为例，讨论李商隐在运用典故和史实上的独特艺术成就。他认为：“是李贺使李商隐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像，进行构思和表现”。李贺的咏史诗“着重表现一种美丽的想像和浪漫情绪，较少深义，因此即使极怪诞到比较好懂”，而李商隐的咏史诗隐寓讽喻，加之其好深、好僻，因此显得密致、晦涩。而最能显示他才能和特色的，是他咏史诗中的七言绝句。“这类作品大多想像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⁴

80年代以后，咏史诗研究开始进入了全面兴盛期，相关的论著，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相当可观。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咏史诗首先要对其进行界定，不过张政烺先生与程千帆先生二位先生的研究文字当中对此并未作出论述，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才受到广泛的关注。学者们或对咏史诗直接作出界定，或通过探讨咏史与怀古及用典的区别，来确定咏史诗的基本特征。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采取了直接界定的方式。较早以这种方式对咏史诗加以理论界定的是缪钺，他认为：“咏史之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史抒发自己的怀抱，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评议褒贬，借以表示对今人今事的称颂与讽刺，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兴之法。”⁵ 与缪先生从兼重艺术表达的角度来讨论咏史诗不尽相同，施蛰存以为“咏史诗不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诗，而是一种特定题材的诗。凡是歌咏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诗，都是咏史诗。”⁶ 马自力进一步指出，咏史诗吟咏的对象可以是历史人物、事件，也可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事迹。吟咏对象的含义或是行为准则的代表，或是某种精神象征，与诗人本身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⁷ 任海天则以为“凡以历史为主体情感寄托的诗作，都可视之为咏史诗”。⁸ 从总体上看，缪钺和施蛰存两位先生的观点，在咏史诗的界说中最有代表性。其它学者的论述大多可以看作是这两种观点的补充和发展。不过，大概由于施蛰存的界定更为宽泛，不少学者在实际研究中都采用了他的说法。⁹

咏史诗的界定中有一个无法回避，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那就是咏史诗与怀古诗的关系。施蛰存曾说：“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¹⁰ 刘学锴也认为：“怀古诗多因景生情，抚迹寄慨，所抒者多为今昔盛衰，人事沧桑之慨；而咏史诗多因事兴感，抚事寄慨，所寓者多为对历史人事的见解态度或历史鉴戒”。¹¹ 两位学者都把咏史与怀古看作是不同的两类诗歌。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降大任和张天建等人。¹² 另外一些学者则在辨析咏史与怀古之差别的同时，把怀古作为咏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向以鲜认为怀古与咏史“产生契机不同，咏史诗是由诗人的感慨推想及历史，是由我及物（历史）；怀古诗则需要实在的（或传说的）物景（古战场等）的触发而产生的感唱，是由物及我。再则，咏史常为作者理智明晰冷静时之作，往往带有哲理性的评价、评论；而怀古诗则触景而发，万千

感慨含蕴其间，抒情色彩较浓厚。”¹³二者虽有差别，但却是一类诗歌。杨恩成也认为怀古与咏史虽然有别，但它只是咏史诗的一种特殊类型。¹⁴还有的学者主张对咏史与怀古不加区分，以咏史怀古诗或咏古诗、怀古诗来统摄二者。如林心志用咏古诗指称咏史怀古诗，王立以怀古诗来涵盖咏史怀古诗。张自新、陈子建等人则把咏史诗与怀古诗作为一类，用咏史怀古诗来加以概括。¹⁵

咏史诗的界定还涉及到咏史与用典的关系。有人认为使事用典是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艺术表现手法发展丰富的衍生物，换句话说，用典是在咏史诗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如江艳华、张学忠、韩理洲、周玲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¹⁶胡大雷更看重的是咏史与用典的区别，认为典故“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篇》），在诗歌当中没有独立意义，故与咏史有明显的不同。只有少数人，如张自新将用事用典作为咏史诗的渊源，认为咏史诗是从诗歌用事用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¹⁷

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了咏史诗与咏怀诗、记游诗的关系。王立主张模糊咏史、怀古和咏怀三者之间的区别，以怀古诗来涵盖三者；¹⁸咏史诗里咏历史陈迹的作品与一般的羁旅行役、登临游览之作有时不易区分，董乃斌主张把咏史诗的“界限定得模糊一点，不可过于绝对”。¹⁹张政烺先生的《咏史与讲史》则探讨了咏史诗与讲史的关系，依他的观点，宋以来的讲史源自以胡曾为代表的咏史组诗。近年，港台学者李宜涯著有《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一书，对二者之关系作了进一步的专门研究。²⁰

二

咏史诗类型的划分，最简单的是从题材内容入手将咏史诗分为咏历史人物、咏历史事件和咏历史陈迹三类。董乃斌先生，买鸿德皆采取此种分类方式。²¹目前学术界多采用从咏史诗运用史实史料的形式入手的分类方式，孙立将咏史诗分为传体咏史诗、论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三类。认为传体咏史诗的特点是：“诗人对史实史料的采用多为一事一人，除对历史人物与历史史实作一般吟咏外，对史实之外的东西没有更多的议论和寄托。”论体咏史诗“对史实史料的采用不一定限于一人一事，有的开始错综历史人物和事件；二是在对史实的叙述中掺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判断。”比体咏史诗，“诗人对史实史料的撷取，不再刻意求其实，也不着意于作一般的叙述，也不是借史料作直露的渲泻，而是对史实取其一点，融入情景的描绘，令人产生篇终接混茫的艺术感受。”也就是“立足于史料，又不依赖于史料，融通于古今、飞跃时空限制，在史料中寓有个人意绪情操”。孙立还认为，论体咏史与比体咏史都是从左思开始的。²²

此外，孙立还对比体咏史诗的寄托方式作了进一步的分类，认为其寄托一般出于三种情形：“一是作者个人遭遇挫折，仕途不利，有志难伸，故借前代史实以自慰自宽、或抒发愤懑；二是当社会鼎革，民族危难之际，以史寄寓兴亡之慨，三是对社会政治机制不满，借历史故实以暗寓己见。”

常乐的《关于咏史》是集中探讨咏史诗体式类型的一篇文章，常文认为咏史诗尚有题画咏史、观剧咏史等体式。此外，历代《宫词》，像王建的宫词百首中不少佳作都可视为咏史。从咏史诗的内涵着眼，他认为咏史诗的类型除上面已经提及的咏人物，咏事件外，还有咏断代史、咏通史、咏读史修史、杂咏等等。杂咏，在常文中是指：“举例若干非同时的历史人物，融为一篇或一朝”的咏史之作。²³

说到咏史诗的类型,我们不能不提到咏史组诗。晚唐时期,以周昙、胡曾、孙元晏、汪遵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创作了一批或以时代为序,或以地名为经的系列咏史七绝。²⁴当然这种组诗并非只限于唐代,体裁也不限于七绝,南宋诗人刘克庄《杂咏三百首》专咏古人,南宋诗人刘屏山有《汴京纪事诗》专咏北宋汴京史事,清代诗人厉鹗作《南宋杂事诗》专咏南宋史事,²⁵其中刘克庄的《杂咏三百首》是五绝。咏史组诗是咏史诗中比较独特一个类别,具体到其中的每一首诗,又可以其具体内容归入以上不同的类属当中。对咏史组诗的研究除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张政烺先生以外,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讨,²⁶赵望秦则出版了专著《唐代咏史组诗考论》。²⁷咏史组诗,胡曾是所有咏史组诗创作者中公认的成就最高的一位,研究也最多。但他的咏史诗只有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对其咏史诗给过较高的评价:其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²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曾《咏史诗三卷》认为其:“兴寄颇浅,格调亦卑”²⁹。总的说来现代学者,对胡曾咏史诗的艺术成就虽然也时有肯定,但基本认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断。咏史组诗的其它创作者周昙、孙元晏、汪遵,张政烺先生曾对其版本、体例以及创作动因都做过论述,此外,张先生还对唐以后的咏史七绝也做了考察。赵望秦在综合各家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考论唐代的咏史诗,如其题旨,其考察侧重唐代咏史诗的史料方面诸如的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的考证,考察范围比如:第五部分周昙《咏史诗》考论,“周昙与历史小说”,最后的“咏经子附论”部分,借鉴张政烺先生,结论比之于张先生当年没有什么突破。

三、关于咏史诗发展历史的研究

中国最早的咏史诗,人们常常称引《诗经》里“雅”、“颂”中那些称颂先祖、追叙其业绩的作品,如《大雅》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颂》里的《那》、《玄鸟》、《长发》、《殷武》等等,或直接称之为咏史诗或认为其开了咏史诗的先河。³⁰也有人直接从班固的《咏史》算起。³¹还有的研究者对《楚辞》与咏史诗的关系作了辨析,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楚辞》的‘引类譬喻’实际上形成了后世‘比’的意念。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³²很早便将咏史诗的源头指向了《楚辞》,近年褚斌杰称《楚辞·天问》“是一首以咏史为内容,而史与论兼备,情与理相融的作品。”³³

班固的《咏史》,以往的评价多承袭钟嵘《诗品》“质木无文”的评定,只肯定其创式之功。蒋方则着眼我国文化重经验、重实证的特点,指出班固的《咏史》“取材出于现实的需要,评价从伦理道德出发,不仅是班固等人咏史诗的特点,而且为后来的咏史诗人所沿袭。”³⁴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肯定了班固的贡献。

探讨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演变的文章,大多紧扣左思《咏史》的“变”与在咏史诗中“己之性情”两方面梳理咏史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班固以降左思之前的咏史诗,如曹操的《短歌行》、《善哉行》、《度关山》以及曹植《豫章行》、《怨歌行》还有与王粲、阮瑀所写的同咏三良的诗歌等等,虽然其主旨是在引喻史事以抒写怀抱,但其主要篇幅仍是在述史,并且其诗人的命意要靠读者的相关背景知识去填

充。³⁵ 因而其与班固创式的咏史诗尚未有质的变化。这和左思的《咏史》八首，“古人古事仅仅作作为引发性情的怀抱的媒介物的方法”的确有较大差异。左思的咏史诗改变了咏史诗耽于述史缺乏诗人自我情感显现的情状，而在咏史诗中将历史的咏叹与身世遭遇交融在一处。³⁶ 将是否能折射自我的影像与怀抱志趣作为选择咏史诗中人物的标准，或截取所咏人物的某个片断，进行刻画，展示历史人物神韵风采。这不只是左思一家咏史诗的特色，在左思同时或之后许多诗人的咏史诗中我们都可以找出类似的特点。张协、袁宏、陶渊明、鲍照等皆是，虽然我们不能说上述作家诗人一定受了左思的影响，但将左思作为魏晋南北朝咏史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枢纽人物，认为其咏史诗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典型风格特征，还是为大家所认可的。不过，班固以来重在述史的论赞式的咏史诗，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初唐。魏晋南北朝除左思之外，蒋立甫先生认为在咏史诗创作上有一定创造性的为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和江淹的《杂诗》三十首。二者皆为组诗，之所以特殊，在于是不单只是写了人物情状还涉及到了他们的写作。³⁷ 南朝时期还有一定数量的怀古诗，范泰的《经汉高庙》、郑鲜之的《经张子房庙诗》等，蒋先生独取庾信的《经陈思王墓》认为在多以读史而咏的魏晋南朝，庾信此诗与阮籍《咏怀诗》：“驾言发魏都”，代表了吊古诗借凭吊伤怀和借凭吊讽喻两种基本写法。在情感表达上，有人认为“悲怆凄凉”是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基本色调，并且与“同时大量出现的宴饮欢娱诗歌的暖色基调恰成情感的两极”。³⁸

唐代咏史诗的演进线索分明，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划分为初盛唐与中晚唐前后两期。初盛唐咏史诗数量不是很多，其咏史诗多借历史人事来颂扬新王朝的德威，或者是颂扬帝王受命于天，造福于民，绝少针砭古人讽刺今世的诗歌。王珪的《咏汉高祖》、魏征的《赋西汉》、李百药的《谒汉高庙》等，尚带有较强论赞意味。³⁹

陈子昂的咏史怀古诗算是一个例外，由于其特殊的际遇，他的咏史诗承左思《咏史》八首，其诗歌多抒发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慨叹，也有对现实政治的针砭。⁴⁰ 盛唐诗人所写的咏史诗相比于初唐，论赞式咏史诗“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时代精神的冲击、诗人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已经不能适应诗人和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受盛唐时代精神的冲击”，自我意识在咏史诗中得到充分暴露，古今之间在诗人胸中也达到了融为一体的境界。⁴¹ 盛唐咏史诗，虽也有个人的怨艾，但对功名的热烈情感始终充溢其中，整体上并不以暴露社会为特征。⁴²

中晚唐是咏史诗的鼎盛时期，唐代咏史诗的创作主要便是集中在中晚唐，流传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中唐大历时期是咏史诗转型的准备期，大历时期诗人的情感意绪往往是对昔日繁华的心追神往、伤时哀世的苦闷与无可奈何的感伤。⁴³ 延至中唐刘禹锡直至晚唐，咏史诗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表现在：咏史诗的数量激增，有唐一代的咏史诗，晚唐占总数的 70%；创作群体空前强大，咏史诗风格体式趋于多样；所采用的历史题材也比前代广阔。中晚唐咏史诗“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色彩与冷峻的理性复合而成”。“思索给感伤力度”，使其没有流于一味的感伤迷惘。⁴⁴ 此一时期论文数量与其在整个唐前咏史诗中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咏史诗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比较晚唐咏史诗的一个较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涌现了以胡曾为代表的一批咏史组诗的诗人。胡曾等人咏史诗的艺术成就历来受人诟病，但其在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还是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赵望秦的《唐代咏史组诗

考论》(三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总结前人成果,对唐代主要是晚唐的咏史组诗作了详尽细致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张政烺先生《讲史与咏史诗》姊妹篇。⁴⁵

四、关于咏史诗艺术美学特征的研究

咏史诗能够引起学者们的特别关注,除了与我国自身的崇实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外,⁴⁶咏史诗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成就当然是最为关键的。但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对咏史诗艺术美学特征的研究,大多结合对其思想内容的讨论来展开的。专门探讨咏史诗艺术审美特征的文章并不多。一般认为艺术上,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奠定了后代咏史诗的基本体式,完成了咏史诗将述史与咏怀逐渐结合统一的过程,在题材类型、结构体式、表现手段等方面对后世咏史诗有着有力的影响”。⁴⁷在“述史与咏怀”这一转变过程当中左思起了一个枢纽的作用。⁴⁸而研究唐代咏史诗艺术成就的论著相对较多,其中又以中晚唐咏史诗,尤其是李商隐、杜牧咏史诗最受关注,⁴⁹晚唐胡曾以降,咏史诗的数量虽然不少,但艺术水准则大大下降,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政烺先生就指出,自晚唐至明人所创作的咏史七绝,“大抵模拟程式相因,既无当于文艺,亦无裨于史学。以自来学者对于此类作品多不注意”。⁵⁰80年代以来,诸家对咏史诗的研究也以唐代为主。⁵¹综合各家观点,以往对咏史诗艺术美学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咏史与抒情的有机融合。杨仲义指出:“咏史诗必须借史抒情”。“它既不同于纪事性极强的史诗,也不同于抒情性较强的历史题材的叙事诗”。⁵²陈子建认为杜甫作于夔州的咏史怀古诗,将咏史怀古与抒写胸臆高度契合,融为一体且情景相因,委曲婉转,含吐不尽;⁵³当然对诗人情感的强调并不是咏史诗所独有的特色,但由于咏史诗题材的特殊性,其抒情的特点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这一批评传统从古代的诗论家们开始关注咏史诗时便已形成。胡震亨《唐音癸签》曰:“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若在作史者不处处别生眼目,然尚是第二义也。”沈德潜也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古诗源》卷七)都认为议论比之于情感要退居次要的地位。左思被推崇,也是得益于在诗中见“己之性情”。

其二,咏史与议论的完美结合。杨恩成说:“咏史诗离不开议论。除了不出己意的叙史诗,作者总要在诗中把个人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判、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和教训上升为对世人有益处的理性认识。”⁵⁴尤其是那些借古喻今的咏史诗,假如离开了作者的个人见解与别开生面的议论,咏史诗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咏史诗的议论特色在中晚唐诗人那里得到充分地体现,杜牧、李商隐、罗隐等等,特别是杜牧,其咏史诗“别于众议”、“议论纵横”的特点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⁵⁵别开生面的议论,实际上也构成了杜牧咏史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其三,现实与历史的巧妙交叠。买鸿德认为咏史诗必须“取材于历史,着眼于现实”。⁵⁶这一点差不多是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公认的。李晖也说:“诗人咏史都是以现实的心理感悟历史,以对历史的感悟观照现实,现实性深厚才能启人心灵,动人情愫。所以,现实性也是咏史诗审美品位的重要条件。”⁵⁷刘洁则在《唐诗审美十论》里,把“现实美”作为唐代咏史诗的美学风范,并从“托古讽今的现实思考”、“以古鉴今的现实目的”、“借古论今的现实反思”等方面讨论了咏史诗的艺术特征。⁵⁸蒋方认为左思咏史诗关注的,不是

历史人物或某个具体事件本身的得失意义，而是为了获得现实生活道路的启示。⁵⁹ 陈伯海认为李商隐咏史诗是借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⁶⁰ 刘学锴则把讽时性作为李商隐咏史诗的首要特征，⁶¹ 张晶也认为，唐代金陵怀古诗具有历史与现实交错、审美意象饱蕴历史反思的特点。⁶² 各家所论都突出了咏史诗现实与历史巧妙交叠的特征。

其四，写实与虚构的高度统一。咏史诗不能完全撇开历史事实作蹈空之论，但如果完全受历史事实限制，又会影响到艺术表达。因此，诗人们往往以适度的虚构想象来处理史料和史实。

韩理洲认为李商隐咏史诗在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体表现在虚构历史和传闻情节、改造史料和传闻和以史料和传闻为引子，驰骋想象等几个方面。正是由于虚构的加入，李商隐咏史诗的内容超越了原来的史料，但却很好地表现了主题。⁶³ 刘学锴也指出，李商隐咏史诗中的想象虚构，多属“七实三虚”式，并没有脱离基本史实和主要情节。不像李贺的某些诗歌如《金铜仙人辞汉歌》、《秦王饮酒》那样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李商隐的那些讽时性较强的作品，能够“寓议论讽刺于精心提炼熔铸的典型场景、情节之中，不着议论，不下针砭，有案无断，具见文意。”不仅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也常常“借助抒慨、设问、反问等方式在篇末将全诗意蕴凝聚起来，显得既奇警道劲又韵味深长”。⁶⁴ 这种处理史料的艺术方法，既不违背历史，又增加了诗歌的艺术美。构成了咏史诗艺术表达方面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创作也有直接的启示。

当然，诗人们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学者们的论述也常常并不仅就某一方面立论，我们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才作了这样的分别。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在成功的咏史诗和高明的诗人那里往往是综合交织在一起加以使用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成就咏史诗独特的艺术美和营造鲜明的意境。故有些学者的论述就是从整体着眼的，蒋立甫就把咏史诗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虚化历史，以史事为感兴，寄托自己的情思；其二是把历史陈迹与自然景物描写结合，发挥了古典诗歌写景抒情的优势；其三是把凭吊历史陈迹与再现历史生活画面结合，在又一个方面发展了凭吊诗的写法；其四是寓大议论于历史细节之中；其五是把拟人、夸张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法引进了咏史诗”。⁶⁵ 这无疑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此外，王红也比较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晚唐咏史诗的艺术美学特征，她揭示了晚唐咏史诗兴盛的标志，并从晚唐文人的特殊心态以及晚唐忧患的时代特征入手，指出晚唐咏史诗在选材上具有偏好悲剧性历史人事的特点。她还从四个方面对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第一，“晚唐人写作咏史诗的意图不在准确地叙述历史，而在于抒发自己观照历史时的情感意绪，甚至是为了负载主观的悲剧性情绪，因此，浓厚的主观色彩覆盖于历史题材之上，成为晚唐咏史诗的重要审美特征。”第二，“晚唐咏史诗中，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与冷峻的理性复合构成。在感伤情绪层下流动着诗人对历史的沉思。思索给感伤以力度，赋予它深沉的特色；感伤濡染思索，使其不免于苦闷迷茫的困扰。”“浓郁沉重的感伤是晚唐咏史诗的情绪基调”。第三，“晚唐咏史诗中的理性因素虽比前代大大增长，但成功的作品都表现为一种“具象”的思考：在饱蕴感伤之情的历史意象中表露作者的认识和判断。”最后“与感伤基调及沉思的特征相应，晚唐咏史诗无爆发式情感表现，多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诗人的感伤弥漫于历史画面或现实物象，呈现出虽不激扬壮烈但深婉朦胧的悲剧美。”“夕阳衰草，残柳落花、荒

阡野烟、寒山危堞、断戟残碑等衰飒意象比比皆是。他们渗透着诗人的情绪，构成了晚唐咏史诗特有的凄凉冷寂的悲剧气氛。”⁶⁶

咏史诗研究中涉及到的问题还有不少，以上只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我们在开头提到过的，程千帆先生的《左太冲咏史诗三论》考论其渊源，别具只眼，从“假史言怀”⁶⁷的艺术手法入手，独举孔融《杂诗》；日本学者兴膳宏考察左思咏史诗的渊源，述及曹魏时代那些常常引述史事而且抽象思辨很浓的乐府诗对左思的影响，也提到了郗炎的《见志诗》⁶⁸，这些对于探讨咏史诗的艺术都是很具启发意义的，但后来的研究却没能继承下来。另外，研讨咏史诗的渊源，《国风·召南》中颂美怀念召公的《甘棠》，以及《小雅·鱼藻之什》里“东周人士回忆西都人物仪容之美，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而作”⁶⁹的《都人士》，比起《大雅》与《颂》的那些颂扬祖先，称述史事的作品，更接近于后世的咏史诗，而论者却很少给予注意。还有，研讨咏史诗，各家往往过分强调时代对咏史诗创作的影响，如对晚唐咏史诗感伤特征形成的原因，诸家往往归之于其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这自然没有错，但登临古迹，面对古墓荒台，情绪是很难轻快的，⁷⁰唐中宗李显的《幸秦始皇陵》，李隆基的《经河上公庙》、《过王濬墓》⁷¹是帝王之作，当时也不是衰颓之世，作者也没有不遇的感慨，但其情感调同样是低沉的。故咏史诗的情感基调，除了时代的影响外，与我们这个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心理也是分不开的。

注释：

- 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 2 《国文月刊》1948年总第70期，署名程会昌；后收入《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以及《腹捡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3 载《文学评论》，1962年6期
- 4 后来刘学锴在《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见《文学遗产》1993年1期）指出：李贺的《还自会稽歌》、《金洞仙人辞汉歌》、《秦王饮酒》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绝大部分内容是凭空结撰之作，其一实九虚式的写法已经超出了咏史诗所能允许的想象虚构的限度，人们一般不把它们看成咏史诗。
- 5 缪钺《略谈杜牧咏史诗》，《文史知识》，1985年7期。
- 6 施蛰存《唐诗百话》第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7 马自力《论陶渊明的咏史诗及其特征》，《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 8 任海天《伤悼与反思：晚唐咏史诗的焦点指向》，《北方论丛》1998年3期。
- 9 如黄筠《中国咏史诗的发展与评价》，《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总第六期）；郭丹《论〈昭明文选〉中咏史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周淑芳《咏史诗：对被理性精神关怀领域的触探与拓展》，《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 10 施蛰存《唐诗百话》第2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11 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文学遗产》1993年1期。
- 12 参降大任《古代咏史诗初探》，《晋阳学刊》1983年5期；张天建《唐诗答客难》，第552页—554页，学苑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
- 13 向以鲜《漫谈中国咏史诗》，《人文杂志》1985年4期。
- 14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1期。
- 15 林心治的《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新探》，《榆州大学学报》1996年1期；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第105页—12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张自新的《咏史怀古诗发展论略》，《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3期；陈子建的《试论杜甫夔州咏史怀古诗》，《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2期。

- 16 江艳华《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略》，《云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4期；张学忠《唐宋绝句议论化的差异及其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4期；韩理洲《李商隐的咏史诗》，《青海师院学报》1980年3期；周玲《论左思的咏史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2期。
- 17 胡大雷《咏史：个体抒情在时间上的扩张——中古咏史诗抒情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张自新《唐山师专唐山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2期。
- 18 刘卫英、王立《怀古诗的诗学本质及其精神史意义》，《求索》1998年6期。
- 19 董乃斌《漫话咏史诗》，《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1期。
- 20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版。
- 21 董乃斌《漫话咏史诗》，《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1期；买鸿德《古代咏史诗简说》，《西北民族学院报》1990年2期；杨恩成将咏史诗分为咏史、怀古、咏怀古迹、览古四类，见《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1期；刘学锴把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分为咏人、咏事、咏怀三类，见《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文学遗产》1993年1期。
- 22 孙立《论咏史诗的寄托》，《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1期。徐礼节在《李商隐咏史诗——传统诗学审美要求的完美实现》中也将李商隐的咏史诗分为传体、论体、比体三类，见《巢湖学院学报》2002年2期；陈文华的《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文学遗产》，1989年5期，将中晚唐咏史诗分为传体、论体、评体。陈文的论体与评体很相近，类似于孙文的论体咏史；还有将咏史诗依有无寄托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见张子刚，赵维森的《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韩国学者金昌庆把咏史诗分为史传体咏史诗与咏怀体咏史诗，见《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可见各家的分类有差别但不大，其中孙立的分类是较有代表性的。
- 23 常乐《关于咏史》《晋阳学刊》1999年第5期。
- 24 周昙咏史组诗上起《唐虞门唐尧》下迄《隋门贺若弼》共195首；胡曾咏史组诗起自共工之《不周山》，迄杨隋之《汴水》共150首；孙元晏专咏六朝史诗共75首；汪遵多以地名为题兼以人名史事，今存诗50首。参《全唐诗》相关部分及张政烺之《咏史与讲史》一文。
- 25 参施蛰存《唐诗百话》，6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26 陈书良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求索》，1986年6期；吴代芳的《评胡曾咏史诗的得失》，《殷都学刊》1988年2期；梁祖莘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0年4期；莫砺峰的《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4期。
- 27 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 28 [元]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传校正》2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29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3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 30 蒋立甫的《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六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彭卫的《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见《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3期；雷恩海《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4期，均是径以咏史诗称之。降大任的《古代咏史诗初探》，说开了咏史诗的先河。见《晋阳学刊》1983年5期。
- 31 陈文华《论中晚唐咏史诗三大体式》1989年5期；向以鲜的《漫谈中国咏史诗》，《人文杂志》1985年3期。
- 32 朱自清《朱自清说诗》，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33 褚斌杰《楚辞要论》，2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天问》的性质，历来有争议，此前郑丹平曾在《〈天问〉——屈原的拟诗史》列举各家观点，加以辨证并结合自己的分析认为“《天问》具有史诗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又与民间传承的史诗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天问》应是屈原创作的一首拟诗史。见《思想战线》1991年3期。
- 34 蒋方《论左思〈咏史〉诗的变体》，《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1期。
- 35 蒋立甫《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六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 36 江艳华《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4期。
- 37 蒋立甫《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六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 38 彭卫《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史学理论》，1994年3期。
- 39 刘洁《唐诗审美十论》，第93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 40 施蛰存《唐诗百话》第5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张自新《自我心灵的烛照与社会盛衰的思考——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冀东学刊》1996年3期。
- 41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1期。

- 42 雷恩海、吴定泫《明丽青春的追求与迷惘——盛唐咏史诗述论》，《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2期。
- 43 张自新《咏史怀古诗发展论略》，《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5期。
- 44 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
- 45 此外还有就咏史诗中的某个专题的研究文章，像：《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陈翔华《文献》，1980年3期），丁乃宽的《马味哀魂 千古奇冤——唐代马嵬诗再研讨》（《殷都学刊》1988年3期）、《历史与诗心灵的碰撞——唐诗咏三国论析》（《文学遗产》1992年5期）兰翠的《评唐人咏王昭君的诗歌》（《昌潍师专学报》2000年6期），杨开达的《历代昭君题材诗词主题思想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3期）等，从不同专题，多方位展示了咏史诗主要是唐代的发展演变。
- 46 向以鲜《漫谈中国咏史诗》：“重传统、重历史的民族特色，使古典作家有鲜明强烈的历史观”。《人文杂志》1985年4期；蒋方《论左思〈咏史〉诗变体——兼论古代咏史诗的文化内涵》：“古代的文字，典籍与史官职事的关系，促成了传统思维重经验、重实证的文化特质。”见《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1期
- 47 江艳华《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略》，《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4期；相关论述还可以参看张子刚、赵维森《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2期；刘曙初《论汉魏六朝咏史诗的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期。
- 48 研究左思咏史诗艺术特征的文章，多就其咏怀特质展开论述，见凌迅《试论左思的咏史诗》，《文史哲》1980年3期；刘文忠《左思和他的〈咏史〉诗》，《文学评论丛刊》第十辑，北京1980年；卢利平《谈“左思风力”：〈咏史〉八首浅见》，《益阳师专学报》1984年4期；周玲《论左思的〈咏史〉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2期；吴小平《论班固咏史诗的诗歌史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3期
- 49 在近二十余年来发表的104篇唐代咏史诗研究论文中，专论中晚唐咏史诗的57篇，专论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的分布有16篇和11篇，是所有诗人当中最多的。
- 50 《讲史与咏史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4月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 51 以专著为例，80年代以来，唐以后咏史诗的研究，笔者见到的只有季明华《南宋咏史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版；而唐代咏史诗，博士论文有金昌庆《晚唐咏史诗研究》（北京大学，1994年），李晓明《唐代咏史诗研究》（华中师大，1999年），港台有李宜涯《晚唐咏史诗研究》（2001年）；硕士论文有李世忠《唐代咏史诗研究》（兰州大学，2003年）。此外，有关咏史诗的专著还有许钢的《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 52 杨仲义《咏史诗的基本特征和美学鉴赏》，《文史知识》1994年8期。
- 53 陈子建《试论杜甫夔州咏史怀古诗》，《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2期
- 54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1期。
- 55 董乃斌《杜牧咏史绝句的艺术特色》《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4期；缪钺《略谈杜牧咏史诗》，《文史知识》，1985年7期；师长泰《论杜牧咏史七绝的艺术特色》，《人文杂志》1986年1期；张润静《气俊思活意足锋锐——杜牧咏史怀古诗中的议论》《学术交流》2002年6期
- 56 买鸿德《古代咏史诗简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2期。
- 57 李晖《昭明文选与咏史诗》，《北方论丛》2001年5期。
- 58 刘洁《唐诗审美十论》99页，108页，11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 59 蒋方的《论左思〈咏史〉诗的变体》，《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1期。
- 60 陈伯海《李商隐和晚唐咏史诗刺政诗》，《社会科学》1981年2期。
- 61 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文学遗产》1993年1期。
- 62 晶《历史的回音——唐代金陵怀古诗》，《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5期。
- 63 韩理洲《李商隐的咏史诗》，《青海师院学报》，1980年3期
- 64 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文学遗产》1993年1期
- 65 蒋立甫《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六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 66 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
- 67 程千帆，《腹检抄》，190—1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68 兴膳宏《左思与咏史诗》，收入《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郦炎诗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六》182—18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69 陈子展《诗三百解题》，8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70 在这里我们采用将怀古诗视为咏史诗的一个类别的处理方式。
- 71 见《全唐诗》24页，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